

留守父母对子女流动范围的影响*

许琪 许庆红 乔天宇

摘要: 以往关于中国劳动力迁移或流动的研究大多沿着经济学的分析思路,认为劳动力迁移的主要目标是实现个体或家庭收入的最大化。本文分析“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的数据发现,在控制经济因素以后,赡养责任也对个体流动范围有显著影响。第一,当老家有兄弟姐妹或配偶照顾父母时,个体更可能选择远距离流动;但如果老家没有他人照顾父母,那么个体将不得不承担赡养责任的影响而只能选择近距离流动。第二,赡养责任对汉族、农村人、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和年龄较大的人的流动范围有更加显著的影响,但对男性和女性的影响并无明显不同。随着生育水平的下降和人口流动的家庭化趋势,未来将有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在老家没有兄弟姐妹且没有配偶的情况下发生流动,其流动范围也将在更大程度上受赡养压力的影响。由此产生的问题需要引起研究人员的关注。

关键词: 留守父母 流动范围 孝道观念 家庭策略

历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随着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逐渐深入和经济发展对劳动力需求的不断增加,我国流动人口的规模在迅速扩大,其流动范围也逐渐从省内跨市、市内跨县、县内跨乡等近距离流动向跨省甚至跨区域的远距离流动发展(段成荣等,2013)。与局限在某个省或某个区域内的近距离流动相比,劳动力跨省或跨区域的转移是一种更加持久、成本更高的人口流动。这种流动方式不仅给流动者及其家庭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增加其融入流入地生活的难度(宁光杰、李瑞,2016);而且会导致各地区人口的重新分布,并关系到地区间经济的协调发展(Fan,2005)。所以,深入研究劳动力的流动范围及其影响因素对了解微观的迁移决策和宏观的人口经济形势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

在已有的研究中,国内外学者大多从经济学的理论视角出发,认为追求较高的经济收益是驱使年轻劳动力选择跨省或跨区域流动的主要因素(戚晶晶、许琪,2013;段成荣,2001;周皓,2006;王兴周,2006;刘家强等,2011),很少有学者从中国的家庭传统出发,研究家庭和文化因素对流动者流动范围的影响。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家庭观念比较浓厚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个体的流动决策不仅关乎个人的经济收益和职业发展,而且关乎整个家庭关系的有效维持和家庭责任的妥善安排。遵循“父母在,不远游”的文化传统,我们认为,对老人的赡养责任也会影响子女对流入地的选择。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有赡养压力的子女更可能选择近距离流动,而不是远距离流动。通过对“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深入分析,本文研究了留守父母对子女流动范围的影响,并分析了这一影响存在的条件和适用的人群。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中国流动人口的流动决策,而且对传统孝道观念和人口流动背景下家庭养老制度的延续和变迁也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和参考价值。

一、理论回顾和研究假设

劳动力跨地区的迁移流动很早就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对此,西方学者提出了三种不同的理论分析视角(戚晶晶、许琪,2013)。

* 本研究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居住安排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研究”(15CRK013)的阶段性成果。

第一种是传统劳动力迁移理论。该理论认为,在市场经济和人口可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劳动力迁移的主要目标是追求预期经济收益的最大化,所以,地区间在预期收入上的差距是驱使劳动力跨地区迁移的主要因素(蔡昉、都阳 2002)。在经典的“托达罗模型”中,劳动力的迁移决策被视为迁入地和迁出地的预期收入水平和空间距离的函数,地区间的预期收入差距越大,距离越短,迁移行为就越可能发生(Todaro, 1969)。

从宏观的角度看,传统的劳动力迁移理论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中国当前人口流动的方向。大量研究发现,我国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主要是从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中、西部省份向相对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流动(段成荣等 2008)。对“城城流动”而言,也主要是从收入水平较低的三、四线城市向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流动(马小红等 2014)。但从微观角度看,这一理论并不能完美解释个体的迁移行为。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个体通过迁移所能获得的经济收益和迁移的心理成本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其自身特征的影响,这导致即使在迁入地和迁出地特征都完全相同的情况下,不同个体也往往会做出完全不同的迁移决策。

为了避免传统劳动力迁移理论的上述缺陷,明瑟(Mincer, 1974)和贝克尔(Becker, 1975)将人力资本理论引入迁移研究,并提出受过良好教育、有外出经验、有移民网络并与亲戚朋友有联系的劳动力更易发生迁移行为等一系列可检验的微观假设,这为迁移的微观分析奠定了基础。国内已有很多学者沿着这一分析思路,研究了劳动者的教育程度、移民网络和移民经历等因素对迁移行为的影响,得到了非常丰富的研究成果(戚晶晶、许琪 2013;胡枫、王其文 2008;李强 2003;姚先国、刘湘敏 2002;赵耀辉 1997)。

传统劳动力迁移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都将迁移视为移民在权衡成本和收益以后做出的个体决策。与这两个理论不同,斯塔克和布鲁姆(Stark & Bloom, 1985)提出的新劳动力迁移理论则认为,迁移是家庭为了分散投资风险、实现家庭整体利益最大化所采取的一种家庭策略。所以,劳动力迁移的分析单位不应是个人,而应是家庭。斯塔克及其同事对博茨瓦纳的一系列研究发现,农民进城务工一方面可以拓宽家庭的收入来源,从而降低单纯依赖农业生产的经济风险;另一方面也可以为农村家庭的发展(如投资新技术和子女的教育等)筹集必要的资金,从而突破家庭的资源约束和农村信贷系统不发达的制度壁垒(Stark, 1991; Stark & Lucas, 1988)。所以迁移不仅关乎个体的收入和发展,而且关乎所有家庭成员的福祉。

新劳动力迁移理论将研究的视野从个体拓展到了家庭,这无疑是在传统迁移理论的基础上向前迈出了一大步。但是,该理论对家庭的关注几乎仅限于经济或收入这一个维度,而很少从更加宽泛的角度来理解家庭对个体的意义和价值。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家庭不仅是一个经济共同体,而且是一个文化共同体(Chu & Yu 2010)。所以,家庭成员的迁移决策除了受经济理性影响之外,还会受家庭伦理和道德规范的制约。

众所周知,中国有着两千多年的儒家文化传统。儒家对孝道的重视要求子女(儿子)在成年以后必须承担起赡养父母的责任。根据儒家经典对孝道的阐释,子女对父母的孝首先意味着要“事亲”^①,也就是说子女需要陪伴在父母身边侍奉父母。因而,儒家文化对父母在世时子女的迁移,特别是远距离迁移是非常反对的。《论语》中曾经提到“父母在,不远游”,指的就是子女不应当在父母需要赡养时迁移到远方。虽然一些学者认为,这种以孝为核心的儒家文化传统已经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和飞速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中呈现出不断衰弱的趋势(阎云翔 2006),但考虑到家庭在当前依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养老功能,我们认为传统的赡养责任依然对子女的流动范围有显著影响,因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 1: 当老家有留守父母时,子女更可能选择近距离流动而不是远距离流动。

假设 1 一般性地论述了留守父母与子女流动距离的关系,而没有讨论这一关系成立的条件和适用的人群。从理论上讲,子女对父母的赡养包括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情感慰藉三个方面。在只

^① 孔子在《孝经》中开宗明义地说“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

有一个子女的情况下,该子女将责无旁贷地向父母提供全方位的支持,但在多子女的情况下,家庭可以通过适当的劳动分工达到更好的赡养效果。具体来说,家庭可以让部分子女外出打工并通过汇款的方式向老人提供经济支持,而让其他子女留在老人身边提供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所以我们认为,当老家有兄弟姐妹时,个体可以更加专注于提高家庭收入,因而他们的流动范围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不受留守父母的影响,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2: 当老家有兄弟姐妹时,个体的流动范围受留守父母的影响相对较小。

不仅兄弟姐妹之间可以通过适当的劳动分工分担赡养责任,夫妻之间也可以通过一定的家庭策略达到类似的效果。具体来说,夫妻双方可以选择一方外出打工,以尽可能多地增加家庭收入;而另一方留在老家照顾老人,从而实现二者的平衡。所以我们认为,当配偶在老家留守时,个体的流动范围相对而言较少受到赡养责任的影响,由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 3: 当老家有留守配偶时,个体的流动范围受留守父母的影响相对较小。

假设 2 和假设 3 论述了留守父母影响个体流动范围的适用条件,接下来的几个假设将进一步论述这种影响适用的人群。前文指出,留守父母对子女流动范围的影响来源于中国传统的孝道观念,但中国的孝道传统主要针对的是汉族,而非少数民族;而且孝道传统只规定儿子需承担不可推卸的赡养责任,对女儿的赡养责任则没有特别要求。所以,如果这两点成立,那么我们预计留守父母对汉族和男性的流动范围影响较大,而对少数民族和女性的影响较小,由此提出以下两个研究假设:

假设 4: 与少数民族相比,汉族人的流动范围更可能受老家是否有留守父母的影响。

假设 5: 与女性相比,男性的流动范围更可能受老家是否有留守父母的影响。

除此之外,如果孝道观念确实是影响子女流动范围的重要因素,那么文化观念越传统的人应该更可能受这种观念的影响。既有研究发现,农村人、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和年龄较大的人通常更加认同传统的孝道观念(曹惟纯、叶光辉 2014)。所以我们认为,这些人群的流动范围更可能受留守父母的影响,由此提出本文的最后三个研究假设:^①

假设 6: 与城市人相比,农村人的流动范围更可能受老家是否有留守父母的影响。

假设 7: 教育程度越低的流动者的流动范围越可能受老家是否有留守父母的影响。

假设 8: 与年轻人相比,年龄较大的人的流动范围更可能受老家是否有留守父母的影响。

二、数据和变量

本文将使用“2015 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的数据检验上述研究假设。“2015 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的数据是由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和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共同设计实施的一项专门针对 15 周岁及以上流动人口的全国性大型社会调查。调查采用了分层、多阶段、概率与规模成比例的抽样方法,样本覆盖了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流动人口。2015 年的调查总共回收有效问卷 206000 份。考虑到研究问题的需要,我们将样本限定为年龄在 50 周岁及以下的流动人口,符合这一要求的样本量为 189340 人。在进一步去除缺失值以后,进入分析的样本量为 189257 人。

本文的因变量是受访者的流动范围,问卷中的原始选项有四个,分别为:市内跨县、省内跨市、跨省和跨境。考虑到跨境流动的样本极少,我们将跨境流动合并到跨省流动。另外,考虑到中国的幅员非常辽阔,同样是跨省流动,省与省之间在地理位置上是否临近差别很大,所以我们又根据受访者的户籍省和流入省在地理位置上是否相邻将跨省流动分为两类:如果相邻则视为跨相邻省,否则就是跨不相邻省。经过上述处理以后,受访者的流动范围由近到远可分为四类,即:市内跨县、省

^① 除了文化观念较为传统之外,农村人和年龄较大的人的流动范围更可能受留守父母的影响也可能是因为这些人的父母有更加迫切的照料需求。无论真实的原因是什么,假设 6 和假设 8 都依然成立。

内跨市、跨相邻省和跨不相邻省。对该变量,分析时将采用标准的定序 logistic 回归模型(ordinal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分析的核心自变量是受访者的父母在老家的居住情况。问卷中询问了受访者是否有年龄在 60 周岁及以上的父母在老家居住,如果有,还进一步询问老家是否有其他兄弟姐妹。根据这两个问题,我们将受访者父母在老家的居住情况分为三类,即:父母不在老家、在老家且老家有兄弟姐妹以及在老家但老家无兄弟姐妹。根据前文的分析,当受访者面临第三种情况时更可能选择近距离流动,而不是远距离流动。

除了上述核心自变量,本文在模型分析时还纳入了很多控制变量。

首先,从传统劳动力迁移理论出发,我们控制了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很多特征。其中,流出地特征包括:流出地所属地区、流出地 2014 年人均 GNP 和一产比重。流入地特征包括:流入地 2014 年人均 GNP 和三产比重、流入地中流动人口的就业率和人均月收入水平。流入地和流出地在 2014 年的人均 GNP 及一产和三产比重均来自 2015 年《中国统计年鉴》,而流入地中流动人口的就业率和人均月收入水平则根据调查数据分地级市汇总得到。

其次,根据人力资本理论,我们在分析时还控制了受访者的年龄、教育年限和外出务工时间这三个主要的人力资本变量以及性别、民族、户口等常见的个体特征变量。

最后,根据新劳动力迁移理论,家庭因素也会影响个体的迁移决策。所以我们还控制了受访者的婚姻家庭特征,包括:婚姻状况、配偶是否住在老家、是否生育过子女、生育子女的数量和流动家庭的规模。

对上述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1 所示。

表 1 对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样本量 = 189257)

变量	均值/百分比	变量	均值/百分比
因变量		婚姻状况(%)	
流动距离(%)		未婚	20.0
市内跨县	19.5	已婚	78.0
省内跨市	30.4	离婚或丧偶	2.0
跨相邻省	19.3	配偶在老家(%)	7.2
跨不相邻省	30.8	生育过子女(%)	73.9
自变量		子女数量(人)	1.1(0.8)
父母是否住在老家(%)		流动家庭规模(人)	2.6(1.2)
不在老家	48.5	流出地特征	
在老家且老家有兄弟姐妹	44.7	流出地所属地区(%)	
在老家但老家无兄弟姐妹	6.8	东部	24.2
控制变量		中部	39.6
个体特征		西部	36.1
男性(%)	52.2	流出省 2014 年人均 GNP(千元)	43.8(13.9)
年龄(岁)	33.3(8.5)	流出省 2014 年一产比重(%)	11.0(3.3)
汉族(%)	92.2	流入地特征	
农业户口(%)	85.6	流入省 2014 年人均 GNP(千元)	54.5(22.3)
教育年限(年)	10.1(2.9)	流入省 2014 年三产比重(%)	45.2(9.1)
流动时间(年)	4.5(4.7)	流入市流动人口就业率(%)	82.5(9.7)
婚姻家庭特征		流入市流动人口人均月收入(千元)	4.1(.9)

注:对连续变量,在括号中给出了标准差。

三、分析结果

在纳入所有控制变量进行多变量模型分析之前,我们首先分析了留守父母和子女流动范围这两个变量之间的简单相关关系。从表2中的模型1可以发现,父母在老家的回归系数为正值,且统计检验结果非常显著。这说明,当父母住在老家时,子女的流动范围反而比父母不住在老家时更远,所以假设1并没有得到数据的支持。

不过,模型1中“父母在老家”这个正的回归系数有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对老家是否还有兄弟姐妹加以区分。当老家没有兄弟姐妹时,个体需要责无旁贷地承担起赡养父母的责任;而如果有兄弟姐妹,整个家庭则可以在多个兄弟姐妹之间进行一种策略性的安排,即:相对而言赚钱能力比较强的会远距离流动以最大化地增加家庭收入,而赚钱能力比较弱的会留在老家照顾父母,从而实现二者的平衡。

为了验证这一观点,我们在模型2中根据老家是否有兄弟姐妹将留守父母的情况分为两类后发现:当父母在老家且老家有兄弟姐妹时,子女更倾向于远距离流动;而当父母在老家但老家无兄弟姐妹时,子女更倾向于近距离流动。由此可见,留守父母对子女流动范围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老家是否有兄弟姐妹对二者的关系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在多子女的情况下,留守的兄弟姐妹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为个体远距离流动解除后顾之忧。但是,当老家没有兄弟姐妹时,个体将不得不受赡养责任的影响而只能选择近距离流动。所以,个体的迁移决策在很大程度上要视老家是否有留守父母和兄弟姐妹而定,假设2得到了数据的支持。

模型2的分析结果也在很大程度上为模型1中正的回归系数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由于模型1没有对老家是否有兄弟姐妹进行区分,在这种情况下,回归系数是包含了有兄弟姐妹和无兄弟姐妹两种情况的混合结果。实际上,从表1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可以发现,父母在老家且有兄弟姐妹的样本数量远远超过了父母在老家但无兄弟姐妹的数量,这导致有兄弟姐妹的情况(正效应)占了主导地位,而无兄弟姐妹的情况(负效应)被抵消掉了。

为了进一步研究留守父母和兄弟姐妹状况对个体流动范围的影响,我们在模型1和模型2的基础上纳入了所有控制变量。从模型3和模型4可以发现,在控制了个体特征以及迁入地和迁出地的很多特征以后,“父母是否在老家”的回归系数的大小略有下降,但系数的方向和统计检验结果并未发生根本的变化。所以,通过模型3和模型4,我们依然可以得到与模型1和模型2完全相同的结论。也就是说,即使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老人的养老需求是否得到满足依然是影响个体流动范围的重要因素,假设2再次得到了数据的支持。

除此之外,从模型3和模型4还可以发现。很多控制变量也对个体的流动范围有显著影响。首先,从个体的基本特征看,男性、年轻人和汉族较容易发生远距离流动。除此之外,个体外出务工的时间(经验)也对流动范围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人力资本理论。但教育年限对流动范围的影响却是负向的,这与人力资本理论的预期并不相符。在已有的研究中,戚晶晶和许琪(2013)使用“2011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的数据时也发现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发生跨省流动的概率反而更小,赵耀辉(1997)对四川的调研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由此可见,在中国,高教育程度并不一定会促使个体发生远距离流动。

其次,从个体的婚姻家庭特征来看,在婚者比未婚者更可能选择远距离流动,但如果配偶在老家,个体则更可能选择近距离流动。生育状况对流动范围的影响比较复杂。与未生育的个体相比,生育过孩子的个体更可能选择近距离流动,但生育子女的数量越多,个体的流动范围反而越远。除此之外,研究还发现流动家庭的规模对流动范围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这说明个体单独外出时更可能选择远距离流动,而举家迁移时更可能选择近距离流动。

最后,迁入地和迁出地的特征也对流动范围有显著影响。与东部地区相比,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流动者更可能选择远距离流动。另外,流出省的人均GNP越低,农业占GNP的比重越高,个体越可

能选择远距离流动。从流入地特征的影响看,流入省的人均 GNP 越高,第三产业占 GNP 的比重越大,对外省和外区域流动人口的吸引力也越大。除此之外,流入地中流动人口的就业率和收入水平越高,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也越大。综上所述,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中、西部省份是我国跨省和跨区域移民的主要来源地,而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沿海省份和地区是我国跨省或跨区域移民的主要目的地。除此之外,较为稳定的工作机会和较高的收入水平是移民选择流入地时需要考虑的两个主要因素。

表 2 父母是否在老家对子女流动距离的影响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父母在老家	.094 *** (.008)		.042 *** (.010)	
父母是否在老家(不在老家=0)				
在老家且老家有兄弟姐妹		.117 *** (.009)		.075 *** (.010)
在老家但老家无兄弟姐妹		-.054 ** (.017)		-.147 *** (.018)
男性			.119 *** (.009)	.123 *** (.009)
年龄			-.006 *** (.001)	-.006 *** (.001)
汉族			.289 *** (.016)	.291 *** (.016)
农业户口			.015 (.014)	.010 (.014)
教育年限			-.049 *** (.002)	-.048 *** (.002)
流动时间			.009 *** (.001)	.009 *** (.001)
婚姻状况(未婚=0)				
在婚			.132 *** (.021)	.134 *** (.021)
离婚或丧偶			.000 (.037)	.003 (.037)
配偶在老家			-.075 *** (.019)	-.077 *** (.019)
生育过子女			-.204 *** (.022)	-.206 *** (.022)
子女数量			.146 *** (.009)	.147 *** (.009)
流动家庭规模			-.097 *** (.005)	-.097 *** (.005)

续表 2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流出地所属地区(东部 =0)				
中部			. 689 *** (. 015)	. 696 *** (. 015)
西部			. 625 *** (. 016)	. 633 *** (. 016)
流出省 2015 年人均 GNP			-. 013 *** (. 001)	-. 013 *** (. 001)
流出省 2015 年一产比重			. 022 *** (. 002)	. 023 *** (. 002)
流入省 2015 年人均 GNP			. 034 *** (. 000)	. 034 *** (. 000)
流入省 2015 年三产比重			. 051 *** (. 001)	. 051 *** (. 001)
流入市流动人口就业率			. 004 *** (. 000)	. 004 *** (. 000)
流入市流动人口人均月收入			. 172 *** (. 007)	. 173 *** (. 007)
截距 1	- 1. 371 *** (. 007)	- 1. 372 *** (. 007)	3. 188 *** (. 084)	3. 196 *** (. 084)
截距 2	. 042 *** (. 006)	. 042 *** (. 006)	4. 888 *** (. 085)	4. 897 *** (. 085)
截距 3	. 857 *** (. 007)	. 858 *** (. 007)	5. 972 *** (. 085)	5. 982 *** (. 085)
伪 R-square	. 0003	. 0004	. 1143	. 1146
样本量	189257	189257	189257	189257

注: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下同。

上文的分析充分说明,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父母是否在老家对子女的流动范围有非常显著的影响。为了进一步研究这种影响的异质性,我们在模型 4 的基础上纳入了父母是否在老家与很多变量的交互项。从表 3 可以发现:

首先,配偶在老家与父母是否在老家的两个交互效应都显著为正。这说明,当配偶在老家时,父母在老家(无论有无兄弟姐妹)对个体流动范围的牵制作用相对较小,假设 3 得到了数据的支持。笔者认为,这主要是因为配偶留在老家照顾父母可以使个体更加了无牵挂地流动到远方赚取更多的收入。所以,夫妇之间可以通过一定的劳动分工实现家庭收入和赡养责任之间的平衡,从而在最大程度上提升整个家庭的福利(包括收入和老人赡养两个方面)。

其次,汉族与父母是否在老家的交互项也是统计显著的。其中,汉族与父母在老家且老家有兄弟姐妹的交互项显著为正,而汉族与父母在老家但老家无兄弟姐妹的交互项显著为负。这说明,对汉族人而言,当老家有兄弟姐妹照顾父母时,他们更可能选择远距离流动以增加家庭收入;而当老家没有兄弟姐妹照顾父母时,汉族人更可能选择近距离流动以承担起赡养父母的责任。由此可见,孝道文化和大家庭的传统在汉族流动人口身上体现的更加明显,假设 4 得到了数据的支持。

第三,性别与父母是否在老家的两个交互项都不显著。所以,父母是否在老家对儿子和女儿的影响是几乎完全相同,假设5没有得到数据的支持。笔者认为,这可能是因为近些年来儿子和女儿对父母的赡养功能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虽然根据中国的家庭传统,只有儿子需要承担正式的赡养责任,但近些年来已有不少研究发现,中国在农村和城市都出现了依靠女儿养老的现象(Xie & Zhu 2009; 唐灿等 2009; 许琪 2015)。本文也发现,父母的赡养状况对男性和女性流动人口的流动决策有相同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前人的研究成果。

第四,农业户口和父母是否在老家的两个交互项都显著为负。这说明,与城市人相比,农村人的流动范围更可能受老家是否有留守父母(无论老家是否有兄弟姐妹)的限制,所以假设6得到了数据的支持。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城乡之间社会保障水平的差异,农村老人比城市老人有更加迫切的养老需求,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农村人的家庭观念比城市人更加传统。

第五,教育年限和父母是否在老家的两个交互项都显著为正。这说明,与教育程度较高的流动者相比,教育程度较低的流动者的流动范围在较大程度上受老家是否有留守父母(无论老家是否有兄弟姐妹)的制约,所以假设7得到了数据的支持。这主要是因为教育程度越低的人的家庭观念通常也越传统,所以他们的迁移决策更可能受传统孝道观念的影响。

最后,年龄和父母在老家且老家无兄弟姐妹的交互项显著为负。这说明,当老家没有兄弟姐妹照顾父母时,年龄较大的流动者较可能选择近距离流动,假设8也得到了数据的支持。这一方面是因为年龄较大的人其父母的年龄也比较大,所以他们承担的赡养压力也较大;另一方面,年龄较大的人家庭观念通常比较传统,所以他们更可能受传统孝道观念的影响。

表3 父母是否在老家与各变量的交互效应

	配偶在老家	汉族	男性	农业户口	教育年限	年龄
男性	.123 *** (.009)	.123 *** (.009)	.120 *** (.012)	.123 *** (.009)	.120 *** (.009)	.123 *** (.009)
年龄	-.006 *** (.001)					
汉族	.291 *** (.016)	.270 *** (.022)	.291 *** (.016)	.292 *** (.016)	.294 *** (.016)	.291 *** (.016)
农业户口	.010 (.014)	.009 (.014)	.010 (.014)	.052 ** (.018)	.011 (.014)	.010 (.014)
教育年限	-.048 *** (.002)	-.048 *** (.002)	-.048 *** (.002)	-.048 *** (.002)	-.056 *** (.002)	-.048 *** (.002)
配偶在老家	-.176 *** (.029)	-.078 *** (.019)	-.077 *** (.019)	-.078 *** (.019)	-.079 *** (.019)	-.078 *** (.019)
父母是否在老家						
在老家且老家有兄弟姐妹	.063 *** (.010)	.005 (.031)	.069 *** (.014)	.128 *** (.025)	-.083 * (.033)	.021 (.042)
在老家但老家无兄弟姐妹	-.160 *** (.019)	.017 (.066)	-.128 *** (.027)	.024 (.042)	-.375 *** (.062)	.042 (.088)
配偶在老家* 父母是否在老家						
配偶在老家* 在老家且老家有兄弟姐妹	.158 *** (.036)					

续表 3

	配偶在老家	汉族	男性	农业户口	教育年限	年龄
配偶在老家* 在老家但老家无兄弟姐妹	.192** (.073)					
汉族* 父母是否在老家						
汉族* 在老家且老家有兄弟姐妹		.077* (.032)				
汉族* 在老家但老家无兄弟姐妹		-.176* (.068)				
男性* 父母是否在老家						
男性* 在老家且老家有兄弟姐妹			.012 (.018)			
男性* 在老家但老家无兄弟姐妹			-.033 (.036)			
农业户口* 父母是否在老家						
农业户口* 在老家且老家有兄弟姐妹				-.061* (.026)		
农业户口* 在老家但老家无兄弟姐妹				-.208*** (.046)		
教育年限* 父母是否在老家						
教育年限* 在老家且老家有兄弟姐妹					.016*** (.003)	
教育年限* 在老家但老家无兄弟姐妹					.022*** (.006)	
年龄* 父母是否在老家						
年龄* 在老家且老家有兄弟姐妹						.002 (.001)
年龄* 在老家但老家无兄弟姐妹						-.005* (.002)
其他变量	略	略	略	略	略	略
截距 1	3.189*** (.084)	3.181*** (.085)	3.194*** (.084)	3.232*** (.085)	3.119*** (.085)	3.186*** (.086)
截距 2	4.890*** (.085)	4.882*** (.085)	4.895*** (.085)	4.933*** (.085)	4.820*** (.086)	4.887*** (.086)
截距 3	5.975*** (.085)	5.967*** (.086)	5.980*** (.085)	6.019*** (.086)	5.906*** (.086)	5.972*** (.087)
伪 R-square	.115	.115	.115	.115	.115	.115
样本量	189257	189257	189257	189257	189257	189257

注：父母是否在老家以“不在老家”为参照组；因篇幅限制，表中仅汇报了交互项及其主效应的输出结果。

四、结论和讨论

以往关于中国劳动力迁移或流动的研究大多沿着经济学的分析思路,认为劳动力迁移的主要目标是实现个体或家庭收入的最大化,而很少有研究从中国的家庭传统出发,探讨赡养责任对子女流动范围的影响。本文使用“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的数据研究了留守父母对子女流动范围的影响,并深入探讨了这种影响适用的条件和人群,主要得到了以下两个研究发现:

第一,在控制流动者的个体特征以及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很多特征以后,老家是否有年迈的父母需要赡养依然对个体的流动范围有显著影响,但这种影响的方向和大小取决于老家是否有其他人能够承担起赡养父母的责任。如果老家有兄弟姐妹或配偶,个体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不受留守父母的影响而尽可能地根据自己或家庭的经济需要选择远距离流动;但如果老家没有他人照顾父母,那么个体将不得不受赡养责任的影响而选择近距离流动。

第二,赡养责任对个体流动范围的影响存在一定程度的异质性。与少数民族、城市人、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和年轻人相比,汉族、农村人、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和年龄较大的人的流动范围在较大程度上受留守父母的影响。这些发现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中国传统的孝道观念在不同群体之间存在的差异性。但父母是否在老家对男性和女性的影响并无明显不同,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如今家庭养老已经体现出儿女并重的特点。

综合以上两点结论,我们认为,虽然很多研究(包括本项研究)发现经济因素是决定我国流动人口流动决策的主要因素。但中国特殊的文化传统使得个体在选择流入地时不仅要考虑潜在的收入水平和发展机会,而且要考虑老人的赡养需求和肩负的赡养责任。虽然从表1可以发现,目前大多数流动人口都有兄弟姐妹,而且相当一部分流动人口有配偶留在老家,所以就当前来看,照顾老人还不是限制流动人口流动范围的主要因素。但是,随着中国生育水平的下降以及人口流动家庭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未来将有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在老家没有兄弟姐妹且没有配偶的情况下发生流动,这意味着未来流动人口的赡养压力会明显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流动人口可能会做出三种选择:第一,不顾老人的赡养需求而选择远距离流动,这无疑会造成老人的赡养问题;第二,选择在老家附近流动,这有助于实现个人发展和老人赡养之间的平衡,但势必对区域间人口流动的趋势和经济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第三,带着老人一起流动,这虽然有助于解决老人的赡养问题,但会大大增加流动的成本,同时也对流入地的养老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本文的分析结果看,流动人口选择第二种方式的可能性较大。但无论未来流动人口如何选择,这种选择可能引发的问题都需引起关注。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陷。首先,本文试图研究的是子女的赡养责任是否会影响他们的流动决策,从这个角度看,是否流动应当是决策的第一步,在决定流动以后,才会涉及到流动距离的问题,但由于数据中仅调查了已经流动的人,对那些因为赡养老人而不流动的情况是无法兼顾到的。其次,虽然数据分析发现留守父母对子女的流动距离有显著影响,但这种影响的产生原因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本文试图从孝道观念和子女赡养责任的角度来解释二者的关联,由此衍生出的多个假设也大多得到了数据的支持,但由于缺乏具体的代际交往方面的数据,我们并不知道因为父母在老家而选择近距离流动的子女是否真的给予了父母大量的支持。近年来关于代际关系的研究发现,除了传统的子女向父母的支持以外,父母也会给予子女各种形式的帮助,如经济帮助、照顾小孩等。所以,子女选择近距离流动的另一种可能是为了更加方便地获取父母的支持。虽然从分析结果看,年轻流动人口的流动距离受留守父母的影响较小,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寻求父母帮助并不是子女选择近距离流动的主要因素,但我们还是无法排除这种可能性。总而言之,子女与父母之间的交往过程是非常复杂的,居住方式只是探讨代际交往的一个窗口,而具体的细节有待于以后获取更加丰富的数据才能知道。

参考文献:

- 蔡昉、都阳 2002,《迁移的双重动因及其政策含义——检验相对贫困假说》,《中国人口科学》第4期。
- 曹惟纯、叶光辉 2014,《高龄化下的代间关系——台湾民众孝道信念变迁趋势分析(1994-2011)》,《社会学研究》第2期。
- 段成荣 2001,《省际人口迁移迁入地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人口研究》第1期。
- 段成荣、杨舸、张斐、卢雪和 2008,《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流动人口变动的九大趋势》,《人口研究》第6期。
- 段成荣、袁艳、郭静 2013,《我国流动人口的最新状况》,《西北人口》第6期。
- 胡枫、王其文 2008,《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山西财经大学学报》第1期。
- 李强 2003,《影响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推力与拉力因素分析》,《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
- 刘家强、王春蕊、刘嘉汉 2011,《农民工就业地选择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人口研究》第2期。
- 马小红、段成荣、郭静 2014,《四类流动人口的比较研究》,《中国人口科学》第5期。
- 宁光杰、李瑞 2016,《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农民工流动范围与市民化差异》,《中国人口科学》第4期。
- 戚晶晶、许琪 2013,《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与流入省吸引力的分析——基于传统劳动力迁移、人力资本、新劳动力迁移与制度变迁理论》,《人口与经济》第3期。
- 唐灿等 2009,《女儿赡养的伦理与公平——浙东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性别考察》,《社会学研究》第6期。
- 王兴周 2006,《农民工:跨省流动与省内流动》,《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
- 许琪 2015,《儿子养老还是女儿养老?基于家庭内部的比较分析》,《社会》第4期。
- 阎云翔 2006,《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 姚先国、刘湘敏 2002,《劳动力流迁决策中的迁移网络》,《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4期。
- 赵耀辉 1997,《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及教育在其中的作用:以四川省为基础的研究》,《经济研究》第2期。
- Becker, S. G. 1975, *Human Capital*.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Chu, C. Y. C. & R. Yu 2010, *Understanding Chinese Famili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aiwan and Southeast Chin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an, C. 2005, "Interprovincial Migration, Population Redistributio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 1990 and 2000 Census Comparisons."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57(2).
- Mincer, J. 1974, *Schooling, Experience, and Earning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Stark, O. 1991, *The Migration of Labor*. Cambridge: Blackwell.
- Stark, O. & D. E. Bloom 1985, "The New Economics of Labor Migr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5.
- Stark, O. & R. E. Lucas 1988, "Migration, Remittances, and the Famil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36(3).
- Todaro M. P. 1969, "A Model of Labor Migration and Urban Unemployment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9(1).
- Xie Y. & H. Zhu 2009, "Do Sons or Daughters Give More Money to Parent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1(1).

作者单位: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许琪)
云南大学发展研究院(许庆红)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乔天宇)
责任编辑: 石金群

have daughters in gender structure. With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on preference” and “family’s economic restriction”, the maximum number of children is three for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fertility intention between old generation and new generation of floating population. The promotion of social stratum could increase the floating population’s fertility intention, there exists an obvious inverted-U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Keywords: Children’s Gender Structure Family’s Economic Restriction Son Preference Floating Population Fertility Intention

The Impact of Left-behind Parents on Their Children’s Migration Scope

..... *Xu Qi , Xu Qinghong & Qiao Tianyu (34)*

Abstract: Regarding the previous researches on Chinese labor migration or mobility, they usually follow the analytical thinking in economics, and argue that the main goal of labor migration is to achieve the maximization of individual or family incom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data from “The Health and Family Planning Dynamic Monitoring Survey of National Floating Population in 2015”,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support responsibility might have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individuals’ migration scope after controlling the economic factor. Firstly, when the individuals have siblings or spouse in hometown to take care of parents, they are more likely to choose long-distance migration. However, if there is nobody left in hometown to take care of parents, then the individuals will have to be influenced by the support responsibility and could only choose the near-distance migration. Secondly, the support responsibility could have mor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migration scope of the Han people, the rural people, the less educated people and the older people, but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men and women. With the decline of fertility level and the trend of family-oriented in population migration, more and more floating population will migrate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of no siblings and spouse in hometown in the future, and their migration scope would be influenced by the support pressure greater. Hence, the researcher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resulting problems.

Keywords: Left-behind Parents Migration Scope The Idea of Filial Piety Family Strategy

The Analysis of Social Psychological Path on the Youth’s Internet Collective Behavior

..... *Lei Kaichun(45)*

Abstract: This study tries to test and construct the social psychological path of youth’s internet collective behavior. According to the study, the collective emotion,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status identity and moral belief influence internet collective behavior significantly. The moral belief and status identity could act as indirect influence, and the collective emotion and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could act as direct influence. The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collective emotion are the total mediation variables of status identity, and the status identity and collective emotion are the total mediation variables of moral belief. The collective emotion and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re mutually independent influencing paths, and there is no mutual augmentation effect. The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is the most important social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to inspire the netizens to participate in internet collective behavior. The study has showed that the moral belief is the key factor to integrate internet collective behavior, and the internet efficacy is the key factor to promote the netizens’ participation in internet collective behavior.

Keywords: Youth Internet Collective Behavior Social Psychological Path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Participation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rganization among Citizens in China and United States *Yin Muzi , Cui Yan & Gao Haizhen (56)*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from “2012 World Values Survey” and “2013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this paper tries to research the participation behavior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rganization among citizens in China and United States.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most participants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rganization in China are young people, while nearly all the people participate in environmental